



## 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思想来源

鲁路

2008-12-15

**【内容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它以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为思想来源，并在接受这一思想来源时经受了阿伦特的交往理论起到的中介作用，从而形成了哈贝马斯立足于公共领域的交往思想。

**【关键词】**交往; Kommunikation; Verkehr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当今国内的热点课题，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思想起源也就成为这一热点课题中的热点话题。虽然说一个概念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可能有不同含义，但由于不同哲学家在表述同一概念时，往往使用同一术语，并因此而体现出彼此间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所以一个概念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思想来源。就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来说，由于马克思也有交往概念，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先从术语上将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同马克思的交往概念联系起来，然后总结它们彼此间在含义上的差别，从而反映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思想所做的发展。但是，辨析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各自使用交往这一术语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哈贝马斯使用的，只是die Kommunikation这一词汇，而马克思使用的，主要是der Verkehr这一词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专著卷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著卷都将马克思难得一用的Kommunikation当作外来词，并解释它的意思是泛泛的联系，也就是Verkehr。这就是说，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分别使用的，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术语，只是由于它们都翻译成同一个中文词汇“交往”，因而相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掩盖了它们在术语上彼此无关这一真实情况。

Verkehr在德文中指铁路交通、贸易往来、货币流通、通信交往等等，在词义上偏重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以物质媒介为手段打破自身孤立状态、建立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多种联系这一客观含义，偏重于人们在一定社会场合泛泛地“打交道”这一现实情况。这里，这个词汇带有的客观性、物质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Kommunikation在德文中指通讯、联络等等，它尤其广泛应用于电信技术发展起来的时代，在词义上偏重于以语言与符号为媒介而进行的个体之间的人际交流。这里，这个词带有的信息性、思想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是结合着生产力的发展讲述交往的，因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Verkehr的扩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正是铁路交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时代感给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带来了深刻影响，恩格斯甚至在他撰写的《不来梅通讯》中将交通业的作用同康德的时空范畴给人类思维带来的解放作用相提并论。[1]与此相反，哈贝马斯讲述的交往，其意义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更加彰显。这就是说，此时的交往概念已经超越了在工业社会背景下去看问题的角度，不再侧重生产与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而是侧重超越这种经济往来的个体间的思想、精神联系，侧重这种联系的亲身性、真实性，以及这种亲身性、真实性相对于人的思想交流、精神寄托、以及社会参与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讲的交互行动同马克思讲的劳动概念大相径庭，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同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在术语与内涵上都大异其趣，与其说Kommunikation是从Verkehr那里引申出来的，不如说Kommunikation另有思想来源。

追寻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术语起源，就要结合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内涵，搜寻它在哲学史上先于哈贝马斯的使用情况。首先，仅就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它意味着主体间观念取代主客体观念这一哲学内涵，因而主体间观念在现代的滥觞为我们搜寻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术语起源提供了思想背景。其次，结合Kommunikation这一交往概念的内涵与术语这两个层面来说，在上述背景下，明确地将Kommunikation当作一个哲学术语来大书特书的，当属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将Kommunikation意义上的交往概念当作他的生存哲学的重要范畴，认为主体间交往突破了人的自我封闭性，将人的生存实现在与他人的交互性行动中；主体间交往突破了主客体关系强加于人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将人阐明为在主体间关系中不断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主体间交往突破了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被给定性、客观上的不自由，使人得以在自我认识上超越自身这种被规定性、深入主体间关系所成就的自由。[2]这样，雅斯贝斯借助于交往概念阐发了海德格共在概念所不具备的内涵，因为海德格共在概念更多地是从自我的存在出发的，

是自我作为此在的在世方式。而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是从自我与他人的交互性出发的，他否认人脱离交往可以单独阐发出生存的内涵来。

雅斯贝斯的哲学体系分为世界导向、生存阐明与形而上学这三个部分，所谓世界导向，即人遵循主客关系模式把握自身的经验性存在的方式，而生存阐明是人依照主体间关系把握自身超越性的方式。人作为经验性存在，也在进行交往，只不过是在主客体关系中进行交往，即Verkehr。人要维系自身的生命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就要为利益起见而同他人彼此争斗或相互联合，将他人视为对立于主体的客体，以自身为目的，以他人作为手段，通过与他人建立Verkehr意义上的联系，来拓展自身支配的客观世界。人作为经验性存在，也在追求自由，只不过是在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的意义上追求自由，而不是说要超越客观规律地追求自由。与此相反，生存阐明所揭示的，恰恰是超越客观规律的自由，因为它认为主体间世界超越主客体世界，因而对客观规律存而不论，专注于非功利性交往，即Kommunikation。所以说，世界导向所演绎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而生存阐明所演绎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交往。Verkehr是世界导向意义上的交往，而Kommunikation是生存阐明意义上的交往。哈贝马斯区分交互行动与劳动、自由与必然，试图在此意义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因循雅斯贝斯区分生存阐明与世界导向的思想，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与其说来自于马克思的交往概念，不如说渊源于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

Kommunikation超越Verkehr，有一个理论演变、发展过程。当年，与马克思同属青年黑格尔派、但与马克思思想南辕北辙的施蒂纳提出了关于惟一者的理论。用今天的眼光看，施蒂纳之所以强调人是惟一者，就是因为他认为，Verkehr不足以做人的本质性规定。但是，施蒂纳尚局限于主客关系思维模式，无法进入主体间交往的视域。他的这一理论缺憾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得到了一定弥补。克尔凯郭尔将人界定为一种与自身的关系，而且是通过关联上帝来关联自身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自我反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客体关系，但尚未完全进入主体间关系，因为克尔凯郭尔对主体间的人际交往是否可能，始终抱怀疑态度。直到马丁·布伯提出“我-你关系”，才最终肯定主体间交往是可能的。布伯将上帝当作绝对之你，将交往中的他人当作相对之你，将与绝对之你的交往同与相对之你的交往贯通起来，将自我反思关系转变为主体间关系。雅斯贝斯大书特书交往概念，就是对这一思想脉络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主体间性观念逐步确立起来的过程、交往观念越来越明确的过程。从这一思想脉络的形成与发展中可以看出，Kommunikation尚在思想萌芽中时，就蕴涵着超越Verkehr的意向，而Kommunikation逐步演变为一个哲学概念的过程，也就是它超越Verkehr的意向得以明朗化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以主体间关系为取向，尽管未必要追本溯源地联系到施蒂纳，但理所当然要追溯到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上去。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言，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直接且惟一来源于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因为雅斯贝斯是在纯哲学意义上讲述Kommunikation的。在他那里，伴随着Kommunikation超越Verkehr这一过程的，是形而上学对社会科学的超越。而且他认为，生存交往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分阐明人的生存，因为生存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类语言，而人类语言是有限的。这就是说，海德格尔讲的言谈是不充分的，人应当去解读超越性存在诉说给人的语言，就像启示那样，当然这要以哲学式语言而非神学式语言来解读，才能把握多元性真理。这就是上文提到的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所讲述的哲学信念。形而上学原本是哲学的同义语，但在雅斯贝斯那里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导向与生存阐明的归宿，Kommunikation的归宿。雅斯贝斯这种浓厚的纯形而上学倾向使得他无意专门研究现实政治领域，而是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Kommunikation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领域，将现实政治语境直接当作哲学语境的延伸与拓展。而这种做法并非哈贝马斯的意旨所在，因为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自然要从现实政治自身出发讲述Kommunikation，而且要牢牢把握现实政治语境，而不是超越现实政治语境。所以说，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虽然在超越Verkehr这一意义上成就了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但只有进一步辨析交往概念在现实政治语境中的独立应用情况，才算得上为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提供最为直接的思想来源。这就是说，交往概念从雅斯贝斯过渡到哈贝马斯，还需要一个中介环节。

构成雅斯贝斯与哈贝马斯之间这一思想中介环节的，是雅斯贝斯的学生汉娜·阿伦特。阿伦特一方面发挥了雅斯贝斯的交往思想，另一方面则涉入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域。就前一个方面说，阿伦特对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做出总结，认为交往不仅是对思想的表达，而且是真理本身的特性，真理就是交往。[3]就后一个方面来说，阿伦特区分开关涉哲学的理性真理与关涉政治的事实真理。例如，她讲道：“政治自由不同于哲学自由……因为享有政治自由的人是公民，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政治自由仅仅体现在团体中……换句话说，政治自由只有在人类群体的领域中才是可能的，其前提是这个领域不是双重的‘我和我自己’到复数的‘我们’的延伸。”[4]对她这番话，我们可以联系雅斯贝斯的交往概念得出一个结论，即雅斯贝斯意义上的“我”与“你”的哲学式交往所实现的自由无法直接引申出“我们”的社会性交往所实现的自由，因为前者作为个体间交往的成果属于哲学语境，而后者作为群体性交往的结果属于现实政治语境，后者不是前者的直接延伸与拓展，而有其独立性内涵，尽管前者与后者的关系类似于康德讲的范导与建构的关系一样，是相互联系的。

现实政治语境有其独立于哲学语境的内涵，事实真理有别于哲学真理，因而阿伦特一改雅斯贝斯从交往的哲学含义直接过渡到其社会政治含义的做法，专门辨析公共领域这一独立性现实政治语境，并认识到：“将政治设想为操作，就是在理论中忽略人的多元性，在实践中压抑个体……而人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形成新看法，采取新行动，不愿屈从可以预见的严整模式。”[5]因此，阿伦特将行动从劳动与工作中独立出来，并在行动这一现实政治语境中阐发“我们”针对集权现象负有的责任。这里的含义是，正因为Verkehr是泛泛之交，是不带有人个体性与多元性的交往，所以才导致将个体予以平均化、泯灭多元性的做法，并导致将政治设想为操作这一现象，即导致集权现象。而有多元性行动，就会有多元性行动间的Kommunikation。个体的多元性行动以及个体间的Kommunikation消除了人在Verkehr中的齐同均一状况与麻木冷漠的政治态度，这才是克服集权现象、通向理想的现实政治之路。因为，因此，阿伦特的意旨是，要在现实政治领域中超越Verkehr地发挥出Kommunikation的意蕴。西方学者评价说，这就是阿伦特“对公共领域或曰作为生存之可能性的政治的关怀。”[6]这里提到的“关怀”同海德格尔的术语“忧”是同一个词汇，它意味着在西方学者心目中，阿伦特将多元性行动从劳动与工作领域中独立出来，突出了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本己性。可见，阿伦特是从公共

领域这一现实政治语境出发，阐发她受生存哲学启发而形成的思想。只是，她在承接雅斯贝斯用Kommunikation超越Verkehr的思想时，消解了雅斯贝斯用形而上学超越社会科学的纯哲学倾向，将雅斯贝斯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关于Kommunikation的认识转变为对内在性的公共领域中的Kommunikation认识。

阿伦特将Kommunikation从哲学语境转移到公共领域语境中这一做法启发了哈贝马斯，尤其是她将权力与暴力对立起来、同交往联系起来这一做法为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权力概念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评价说：“阿伦特则把权力看作是非强制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共同意志的潜力。……这样一种交往权力，只可能形成于未发生畸变的公共领域之中。它只可能产生于未受扭曲之交往中的那种未遭破坏的主体间性结构。”[7]可见，哈贝马斯视Kommunikation为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也正是在这一将交往观念贯彻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中，哈贝马斯克服了阿伦特论述个体性、多元性文字较多，而论述个体间交往文字略少这一偏向。另外，哈贝马斯深入研究语言学，[8]固然是为了辨析作为社会行动的Kommunikation的规范性标准，但也是针对雅斯贝斯强调人类语言不够充分、因而超越Kommunikation地转向超越性存在所做出的举措。哈贝马斯要驻足于公共领域这一内在性思想层面，恪守Kommunikation的价值，就要充分辨析语言应用的合法性，挖掘语言作为Kommunikation之媒介的可能性。这也是他将普通语用学研究纳入自己的交往理论的原由。他强调陈述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辨析言内行为、言后行为，从目的上说，为的是从语用学角度出发辨析Kommunikation的可能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他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9]从认识结论上说，他指出，认知与陈述总要以交互行动为前提，即以对话双方就陈述的规范取得一致或默契为前提，因而交往是认知与陈述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等等由来的。这种认识结论是哈贝马斯涉入商谈伦理学的条件，因为商谈伦理学是以Kommunikation这一理想性语境而非Verkehr这一一般性语境为条件的。卢曼之所以批评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过于理想化，不成其为从实际出发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因为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悬设了Kommunikation这一理想。对于这一理想悬设，另有西方学者评价说：“为了将行为解释为富有意义的或理性的行动……我们必须认定，个体在总体上是在理想化假定条件下行动的。而且，个体的所有行动只有作为关联理想化假定条件的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10]这就是说，Kommunikation固然有理想化特点，但这种理想化特点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所必需的语境，是他以Kommunikation为核心的社会哲学所必需的语境。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从雅斯贝斯与阿伦特这一思想脉络中秉承的交往观念贯彻于他的思想的始终，而雅斯贝斯在生存哲学意义上论述的交往概念有待于在涉及公共领域的社会哲学中得以进一步析化，这一点也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得以完成。另外，当我们批评哈贝马斯忽略交往的物质性因素时，应当注意到，仅就交往理论本身来说，交往的物质因素在今天未必仍然是需要一再重复的哲学话题，而超越Verkehr这一思维层面，进一步阐发Kommunikation这一在当今更有时代感的话题，则可以理解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做出的发展。对于这一更有时代感的话题，西方学者评论说：“于尔根·哈贝马斯……从世界主义、多元主义与后威斯特法伦和约精神的后阿伦特倾向中看到了希望。……例如，哈贝马斯建议，用立宪爱国主义取代种族民族主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团结不是立足于随便什么所谓的前定实质性同一性，而是形成于‘在交往中克服矛盾’。”[11]这里讲到的实质性同一性，也就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阶级、国家等实体的问题。而在哈贝马斯的时代，在西方社会，阶级界限越来越模糊，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所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针对的当今问题，不同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历史上所针对的问题，即不再是Verkehr造就的实质性同一性，而是非同一性基础上的Kommunikation。这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区别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关键所在。

关于哈贝马斯交往思想的来源，国内学者多有著述，如哈贝马斯从马克思关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析中得出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之分的结论，[12]哈贝马斯从黑格尔的耶拿手稿中识别出主体间性思想的意蕴，[13]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受惠于阿伦特对权利与民主之认识的启发，[14]等等。而本文专门论述哈贝马斯从雅斯贝斯、阿伦特这一思想脉络中汲取的Kommunikation超越Verkehr的含义，则构成国内学者认识哈贝马斯交往观念这一视域中的一个剪影。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2]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哲学》第二卷“生存阐明”，施普林格出版社1973年柏林、海德堡、纽约版，第50-117页。

[3] 参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4] 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5] 马格莱特·卡诺万：《导论》，载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xii页。

[6] 罗兰特·贝纳：《真理与政治》，载于瓦尔特劳特·梅因茨、卡特林纳·克林格（编）：《政治与责任——论汉娜·阿恩特的现实性》，奥斐岑出版社，2004年汉诺威版，第134页。

[7]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81-182页。

[8] 参见德特勒夫·霍斯特：《于尔根·哈贝马斯导论》，尤尼乌斯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页。

[9] 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0] 肯尼思·贝内斯：《先验性转向：哈贝马斯的康德式语用学》，载于弗雷德·拉什（编）：《批判理论》，三联书店2006年影印版，第198-199页。

[11] 南希·弗拉塞：《汉娜·阿恩特在21世纪》，载于瓦尔特·劳特·梅因茨、卡特林纳·克林格（编）：《政治与责任——论汉娜·阿恩特的现实性》，奥斐岑出版社，2004年汉诺威版，第77-78页。

[12] 参见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3] 参见李淑梅、马俊峰：《哈贝马斯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 参见汪行福：《通向民主对话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来源：《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上一条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十年研究述评  
下一条 哲学信仰与神学信仰的对照——雅斯培尔斯的形而上学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